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（第五辑）

财政学原理

〔英〕达尔顿（H. Dalton）著 杜俊东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
· 经济学（第五辑）

财政学原理

〔英〕达尔顿（H. Dalton）著 杜俊东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财政学原理/ (英) 达尔顿 (Dalton, H.) 著; 杜俊东译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经济学)

ISBN 978-7-5520-1200-2

I. ①财… II. ①达…②杜… III. ①财政学 IV. ①F81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6298号

财政学原理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刷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160千字

印 张: 17.875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200-2/F.393

定价: 84.00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譯者序

中國士大夫對於理財之學，向極輕視；『君子不言利』爲統治中國思想界的儒教對於財政學的消極態度。偶有一二能幹的財政家出，亦羣目之爲『聚斂之臣』，而大學曰：『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』，其詆譏財政家有如此者。但自五口通商之後，經濟社會，日益複雜，政府職務，日益繁多，而國家的財政狀況，亦日益陷於困危之中。在西洋，財政學的發達，實遠在經濟學成立之先——在重農學派 (Physiocrates) 和亞丹·斯密 (Adam Smith) 之先，德國的計臣學派 (Kammernals) 對於理財之學，已經研究很盛了。近代各國學者對於財政之理論與寫實的研究，更是不遺餘力。中國各樣學術都落人後，素所忽視的財政學，自然更甚；寫實的研究，沒有完全的可靠的材料；理論的研究，亦祇能翻譯幾本外人著作而已。

中國最早介紹過來的近代財政學說，恐怕還是始自兩部日本人的著作（小

川鄉太郎和小林丑三郎的著作。其實日本亦不過販自西洋，他們自己對於此學並無任何單獨的貢獻可言。此後方有人將亞當士(H. C. Adams)的財政學大綱(*The Science of Finance*)和愛倍格(Eheberg)的財政學(*Finanzwissenschaft*)等書翻譯過來。然而這些書現在都已老得不堪。最近英美出版之財政學書，據個人所知者如皮古(Pigou)，魯濱孫(M. E. Robinson)，陸資(Harley L. Lutz)，希拉(Findlay Shirras)以及賽力格曼(R. E. A. Seligman)等人之著作，較以前各書，雖在時間上不過一二十年之差，然因世界情勢之激變，內容却大有進出。我們現在研究財政學，第一，自然先須拋棄輕視此學的傳統觀念；其次，便要迎頭趕上世界的潮流。然後方說得上『研究』。

這是無庸諱言的，我們現在談財政學，仍未能脫離翻譯時期。然而西洋一般講財政的書籍，都不免混進一些各國的特殊事實。許多很好的著作，每因此種關係，而不適於遙譯。但在純講理論的著作裏，則比較的好些。而且理論的研究，亦為寫實的

研究之基礎。近代國家的財政事實時刻在變化之中如無幾個根本的原則以爲規矩，直使我們如墮五里霧中，茫然不知何從下手。

達爾頓博士(Hugh Dalton, M.A. Cambridge, D. Sc. London)爲英國倫敦經濟學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)教授，此書即爲其在該校講『財政學理論』一課之底稿。他不滿意於一般的財政理論，及發揮自己的意見，獨成一家之言。他的理論，即使在西洋也是嶄新的。

達氏的理論之中心，即是最大社會利益之原則(principle of maximum social advantage)。財政上的大部活動，是一些購買力之轉移。轉移的結果，財富的性質與數量，及其在個人間與階級間的分配情形，都有了變化。這些變化的總影響，自社會看來果是有利的嗎？倘若是有利的，則此活動爲正當；否則即爲不正當。最好的財政制度，即於其所行之活動中，能得到最大社會利益者。此『最大社會利益之原則』，即爲達氏理論的出發點。

從這個原則出發，他論到公共經費，以爲如果再增加一點，則其所生之社會利益與社會損害相消時，即當就此而止。在這個限度之外，是沒有必要的限制的。論到公共收入，他以爲總收入在各種租稅及各種財源間之分配，『務使社會損害與邊際效用相等。』

於此書中，達氏更建立了公共收入與公共經費的平行關係。他將公共收入分爲租稅收入及代價收入 (selling price) 兩大類；同時，將公共經費亦分爲相當的兩大類：相當於租稅收入者，爲賜贈經費 (grants)，相當於代價收入者，爲代價經費 (purchasing price)。租稅可分爲直接的或間接的，賜贈亦可爲直接的或間接的；有累進的，累退的或比例的租稅，亦有累進的，累退的或比例的賜贈；租稅有『納稅能力』 (ability to pay)，賜贈亦有其『受贈能力』 (ability to receive)；至於代價收入之與代價經費的平行，更爲顯而易見。

財政學理論之於實際的財政，猶文法之於語言文字。不過二者所不同者，語言

文字的文法，是一般所公認的，而財政學理論，祇是一種意見而已。達氏的理論，跳出了傳統的漩渦，成立自己的體系，實財政學界一個有價值的嶄新的意見。

譯書是很繁難的工作，中文與英文的調子根本不同，所以直譯易遭失敗，但意譯又每與原意不符。譯者下筆之時，是向着『不失作者的原意，而寫成可讀的國文』這個方向努力的。但以個人時間學力之不足，牽強謬誤之處，或所難免。倘承讀者教正，感謝不盡。

〔九一八〕週年杜俊東序於南開大學百樹村。

作者原序

這本書包括我在倫敦經濟學院 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) 所講『財政學理論』一課的梗概。其設計乃如培根 (Bacon) 所說：『是簡單的鼓勵人家判斷而非麻煩的告訴人家判斷。』我的目的，在於毫不偷巧的敘述可以應用於近代社會的財政之重要的一般原理。因為基本原理之研究，是討論實際問題所必要的準備，且欲對於學得一總括之觀念，亦有莫大之幫助。在一個總括的觀念之間架裏，可以填上特種觀念及特種事實。如此可使其不致成為孤獨分立的東西，而是放在其與全體的關係之上的。

雖然我似乎偶爾有些奢望，但我的目的，並不是在這本書中讚成任何詳細的實際政策。我不過祇是指出一些為任何完美政策所必須根據的一般攷慮而已。現在財政上的事實移動得這樣快，因之寫實的研究，不久即成陳腐；實際問題所表現

的形式，時刻在變化之中。不過有一些一般的原則，却不盡然。因為不知道或者忽略了這些原則，曾使世界受了很大的經濟損害，而且現在還是如此。所以在討論的時候，我有時轉而批評一些租稅、公共經費及公債等問題的流行意見，那些意見，我相信是根據謬誤的判斷和昏瞶的頭腦而來的。

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於公共經費，都多少持着消極的態度，且已習以為常。我則試將這個問題看得積極一些，而且指出公共經費論與租稅論二者之間的平行關係。

書中很少引用他人著作之處。但為讀者便利起見，如有對於此學願作進一步之研究者，我在書後加了一個短短的書籍介紹。

修·達爾頓 一九二二年十月
於倫敦經濟學院。

目錄

第一編 緒論	一—二四
--------	------

第一章 財政學之性質及其內容	一
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節 財政學之意義	一
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節 公共收支之性質	二
-------------	---

第三節 財政學之內容	四
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最大社會利益原則	七
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節 公共收入與公共支出之平衡	七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節 最大社會利益原則	一〇
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 社會利益之標準	一一
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節 對於幾種謬論的批評	一二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公共財政與私人財政	一七
---------------	----